

一 试论近代中日文化的交流

(一)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文化的发展，都不可能是孤立封闭的自我繁殖，而总是要和别国的文化进行交流，互相影响、补充、渗透，不断借鉴、吸收、融合外来文化。这种文化交流对于各国社会的进步，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研究各国之间文化交流的历史，应该是历史研究，特别是文化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上，中国与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之间的交流格外引人注目。这不仅是由于两国之间文化交流的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两千年来连绵不断；而且交流的范围十分广泛，几乎涉及文学、艺术、教育、科技，体育以及风俗、习惯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更重要的是它的影响深远，可以说对于两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的发展，以至民族感情、国家关系、革命运动、人民友谊、日常习俗等等，无不发生极其巨大、深刻的影响。

提起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人们往往立刻会想到古代时期日本遣唐使西来，中国鉴真和尚东渡等等脍炙人口的动人事迹。中日两国学者对此已作了不少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然而，由于近代时期中日关系的复杂化，尤其是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历史学家们更多注意的是近代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和军事斗争，而对于这个时期具有新特点、新内容的文化交流，似乎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研究相对比较薄弱。因此，随着中日友好

关系的发展，文化交流的频繁，以及近代文化史研究的深入，加强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已经成为一个重要而又迫切的课题了。

通过考察近代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与特点，可以进而分析它对中日两国文化思想的进步和政治经济发展的关系，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互相理解和传统友谊。同时还可以总结两国进行文化交流和如何对待外来文化等方面的历史经验，探讨建设民族文化的规律。对于我们当前如何正确批判地继承祖国文化遗产，借鉴外来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方面，也会有一定的启发。

(二)

如果说古代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是灿烂辉煌的话，那末，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也是非常丰富多彩的。无论从规模和内容来看，它比古代都有很大的发展，并具有新的特色，而且更富于广泛性、群众性。

在古代，中日两国之间并无正式的外交关系，只有少数使臣、商人、学者、僧人来往，日本遣隋使、遣唐使的盛举是其中的高潮。当时仅靠帆船过海，面对惊涛骇浪，要冒很大的风险。以至唐朝鉴真和尚先后六次东渡，九死一生，双目失明，才抵达日本。加上 17 世纪以后，清政府的“闭关政策”与日本德川幕府的“锁国政策”，更给两国的交往制造了严重的人为障碍，因而直接的文化交流始终只能在少数人之间进行。到近代，航海技术大大进步，乘坐轮船，只要几天时间便可安全横渡滔滔东海。两国“闭关”、“锁国”的大门先后打开，尤其是 1871 年（清同治十年，日本明治四年），中日两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并订立了通商条约。不久，两国先后派出了长驻对方的外交官，互设了公使馆与领事馆，贸易、交通往来也迅速发展起来。这就为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从此，两国的官员、学

者、文人、商人，考察、访问、游览、旅行、留学、经商，来往络绎不绝。仅笔者所见所闻，近代中国人所写访日游记就有一二百种之多，而近代日本人的访华旅行记也为数不少，为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提供了大量资料。

20世纪初，大批中国青年留学日本，又把近代中日文化交流推向新的高潮。数以千计的中国青年学生涌向日本各地，深入到日本民间，通过求学、结社、集会、翻译出版书刊等各种方式，开展中日文化交流活动，并与日本人民建立起深厚友谊。使这个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更具有群众性，内容更加广泛。这个盛极一时的留学日本热潮的出现，是有其历史背景的，当时中国正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许多爱国的青年把留学日本作为学习外国以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重要途径。而清末废除科举也促使更多的知识分子从海外留学中寻找出路。洋务派官僚张之洞曾说过：“出洋一年，胜读西书五年”，而“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二、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①

中日两国地理邻近，交通方便，路费便宜，文字相近，风俗相似，这些都为留学日本与开展中日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就拿文字来说，中日两国都用汉字，多数日本知识分子都会写汉文、做汉诗，因此有时尽管语言不通，双方也能以汉字笔谈或唱和汉诗来交流思想，抒发情感。保存下来的大量中日文人之间的笔谈记录与唱和诗集，都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珍贵史料。例如日本贵族大河内辉声与黄遵宪等中国友人笔谈的详细记录达近百卷。^② 还如黎庶昌任驻日公使期间，使馆人员与日本文人唱和的汉诗也有好几百首，编成诗集若干种。^③ 这种文化交流的特殊

① 张之洞：《劝学篇》。

② 参见实藤惠秀：《大河内文书》、《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记录》等书。

③ 如《重九登高诗》、《癸未重九燕集篇》、《戊子燕集续编》、《庚寅燕集三编》等。

形式，也使中日两国人民从感情与心理上更有一种亲近感。

(三)

文化交流既然是交流，总是双向的，双方互相影响，互相吸收。可是，在一段时期里，往往会有一个主要的趋向。

在古代，由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相对比较发达，中日文化交流较多的是中国文化输向日本。这对古代日本社会的进步和日本文化的形成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至今在日本文化和社会生活、风俗习惯中还可以明显地看到中国古代文化影响的烙印。日本著名学者内藤湖南曾经把中国文化在日本文化形成中的作用，比喻成做豆腐时点卤水，他说：“豆浆之中虽然已经有了豆腐的成分，但是还需要加上其他力量使其凝结，而中国文化就是像卤水那样一种凝固剂。”^①

到了近代，交流的主要趋向逐渐发生了逆转。这是由于中国清政府腐败保守，国势江河日下，逐步沦为受帝国主义欺凌宰割的半殖民地。而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通过学习西方，维新改革，进步很快，不但保持了独立国地位，而且进入了世界资本主义强国之列。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老大的中国竟被新兴的日本一举击败，以至屈辱求和割地赔款。进步的中国人在谴责日本侵略的同时，也提出了向日本学习，变法维新的主张。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康有为公开鼓吹“不妨以强敌为师资”。认为吸取日本维新改革的经验教训，可以“收日人已变之成功，而舍其错戾之过节”。^②他还形象地把日本比喻为中国变法改革的“乡导之卒”、“测水之竿”、“探险之队”、“尝药之神农”、“识途之老马”。指出学习日本经验，可以“尽收其利而去其害，何乐

① 内藤湖南：《什么是日本文化》见《内藤湖南全集》第9卷。

② 康有为：《日本变政考》序。

如之!”^①这也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批中国官员、学者去日本考察，大量中国青年去日本留学的重要原因。近代中国人通过访问、调查、留学、编译书刊等文化交流的各种形式，学习日本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科技，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中日文化交流中还有一种有趣的现象，即它还往往充当传播介绍第三种文化的媒介。在古代，中国曾经向日本传播过印度文化。玄奘等中国高僧不畏艰难去印度取经，而鉴真等中国高僧又历尽风险往日本传经。还有不少日本僧人来到中国寺院学习，带回很多佛经和经过中国消化吸收了的印度佛教文化。到江户时代，日本又开始接受西方文化（当时主要是荷兰人带来的，故称为“兰学”），不过当时日本人的西方文化知识还非常有限，阅读西文书籍也很困难。19世纪40到60年代，中国一些开明的知识分子被鸦片战争的炮声惊醒，开始睁眼看世界，写出了一批介绍世界各国形势的史地著作。这些书很快传入日本，并立即被翻译、刻印，广泛流传。如魏源的《海国图志》百卷本，1852年出版，1854年便传入日本。^②据不完全统计，仅仅1854—1856年三年之间，日本刊印《海国图志》的各种选本（包括翻印本、日译本、训点本）竟达21种之多。^③一部著作能在出版后短短几年内，在另一个国家就有这么多种译本，这在世界各国文化交流史上恐怕也是罕见的。这些书对于明治维新前日本人了解世界大势，接受西方文化，以至维新思想的形成都起到一定作用。可是，腐败保守的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后依然浑浑噩噩、妄自尊大，把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称为“奇技淫巧”，把学习研究西方文化诬蔑为“以夷变夏”，致使中国在近代进步缓慢，落伍于世界。

① 康有为：《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见《康有为政论集》（上）223页。

② 大庭修：《江户时代唐书持渡书研究》。

③ 鲇泽信太郎：《锁国时代日本人的海外知识》。

连日本有识之士在翻印《海国图志》时也为之叹息，“呜呼！忠智之士，忧国著书，不为其君之用，而反被琛于他邦”。^①相反，日本政府在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提出了“文明开化”的口号，积极学习西方文化。它派出高级官员和留学生到欧美各国深入考察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制度与文化、科学、技术，还翻译了大量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著作。致使日本只用了短短几十年便取得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花了一二百年才达到的成就，进入世界强国行列。日本向西方学习的成功更增强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愿望。但是，由于当时直接去欧美与翻译西文著作比较困难，而去日本与翻译日文书籍比较容易，并且日本人已经把西方文化加以筛选、消化，因此，中国人把通过中日文化交流的渠道来学习吸收西方文化，看作为一条可以事半功倍的捷径。康有为形容道：“譬如作室，欧美绘型，日本为匠，而我居之也。譬如耕田，欧美觅种灌溉，日本锄艾，而我食之也。”^②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说，以及各种新思潮，包括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不少也是中国留日学生根据日文书籍或西文原著的日译本介绍传播到国内来的。

中日文化交流在两国吸收西方文化上起了很大作用。然而，近代中日两国在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上有很大差别。中国封建统治集团和上层知识分子比较保守、顽固，长期以来儒家思想的统治、中华文化的优越感，以及科举、八股制度都严重影响吸收外来文化，阻碍中国文化的发展进步。而日本民族向来有着虚心吸收外来文化的传统，并采取积极的态度、有效的方法，同时又力图把外来文化与民族文化有机地融合起来。在这方面作一些比较研究，也是很有意义的。

① 盐谷宕阴：《翻刻海国图志序》，见《宕阴存稿》卷四。

② 康有为：《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

(四)

近代中国和日本的文化交流同近代两国的政治、经济发展、社会进步、革命运动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近代初期的文化交流，特别是中国的《海国图志》、《瀛环志略》和《夷匪犯境录》、《满清纪事》、《粤匪大略》等一批介绍世界史地与叙述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的书籍输入日本，对处在西方列强冲击和幕府封建统治危机之下的日本震动影响很大。日本幕末的思想家们把它们看成是打开眼界、了解世界大势的启蒙读物，制订防御外敌策略的“有用之书”。日本有识之士还把中国发生的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称之为“天赐前鉴”。^① 他们为了使日本避免重蹈中国的前车覆辙，结合日本实际，认真总结中国的历史经验教训，促进了倒幕维新思想的产生，推动了明治维新运动。当时日本还出现了一批以中国的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为题材的民间小说，据笔者所见就有十几种。日本作家通过描写中国题材的文学作品来表达对中国事态的关注和对邻国人民革命的同情，同时也寄托对本国前途的忧虑和希望。这也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一种值得注意的有趣现象。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中日文化交流对中国政治思想的发展影响更大。中国的官员、文人通过出使日本以及考察、访问，亲眼目睹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变化，大多数访日游记和研究日本的著作都盛赞日本维新之成效，探讨日本迅速富强起来的原因。有的作者进而提出了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榜样，在中国进行变法改革的主张。首任驻日使团参赞官黄遵宪所著《日本国志》就是这样的一部代表作。19世纪末，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几乎人

^① 枫江钓人：《海外新话》序。

人鼓吹仿效日本变法，其集大成的作品就是康有为在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日夜赶写出来进呈给光绪皇帝的13卷《日本变政考》。此书详细介绍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各项新政措施，评论其得失，并提出中国变法的具体建议。他把日本明治维新看作是中国戊戌维新的理想蓝图，因此声称“我朝变法，但鉴于日本，一切已足”。^①

20世纪初至辛亥革命前，由于大批留日学生的关系，日本成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活动基地。孙中山、黄兴等领导人都曾长期在日本开展革命活动，并得到不少日本友人的帮助。1905年同盟会在日本成立，总部就设在东京。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日本创办报刊、出版书籍、集会讲演，并翻译各种日文、西文有关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的著作。这一方面是进行革命宣传，为辛亥革命制造舆论，同时也是一种中日文化交流活动，并使日本人民进一步了解中国和中国革命。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也都是留日学生。他们所提倡的民主、科学，新思想、新文化，有不少也是受了日本进步思想文化的影响。李大钊等人在日本还初步接触到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日本进步学者幸德秋水所著《社会主义神髓》，他与界利彦合译的《共产党宣言》以及河上肇译解的《资本论》等日文书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都有重大影响。当时进步的中国人正在艰苦地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马克思主义使他们在黑暗中见到了光明。周恩来同志也是在1917—1919年留学日本期间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他在当时所写的《雨中岚山——日本京都》一诗中，描绘自己在各种学说中接触到马克思主义革命真理时的喜悦道：“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见到一点光明，真愈觉

^① 康有为：《日本变政考》。此书进呈本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正文共12卷，最近又发现尚有附表1卷。

较研。”^①

(五)

中日文化交流还架起了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桥梁，增强互相了解，沟通思想感情，打下了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的牢固基础。

古代时期由于种种条件限制，中日两国互相了解较少，尤其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还是十分模糊肤浅的。直到清代中叶的一些著作中，连日本是由几个岛组成的还搞不清。而鸦片战争后出版的《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尚把日本说成主要由长崎、萨峠马（即萨摩）、对马三岛组成。有的人甚至还在重复日本乃“三神山”那样的无稽之谈。正如黄遵宪在一首诗中写的那样：“只一衣带水，便隔十重雾。”^②

到近代，尤其是中日建交之后，大批中国官员、文人、学者联翩东渡，并有外交官常驻。百闻不如一见，通过在日本的实地考察和文化交流，中国人开始对日本有了比较正确全面的认识。黄遵宪对日本进行了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写出《日本国志》一书，向中国人民全面介绍了日本的历史与现状，长期以来成为中国人了解日本的必读之书。19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的介绍日本著作还有姚文栋《日本地理兵要》、陈家麟《东槎闻见录》、顾厚焜《日本新政考》、傅云龙《日本游历图经》等书。至于各种访日游记、日记、考察记、以及日本人访华的旅行记，更是不计其数。这就使中日两国人民大大加强了互相了解，沟通了思想感情。这些著作的作者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黄遵宪写作《日本

① 周恩来：《雨中岚山——日本京都》，见《“五四”前后周恩来同志诗文选》，54页。

② 黄遵宪：《近世爱国志士歌》，见《人境庐诗草》卷三。

国志》，前后花了八九年时间，“频年风雨鸡鸣夕，洒泪挑灯自卷舒”。^①他以顽强的毅力克服了各种困难，终于完成了这部40卷50万字的巨著。傅云龙在1888—1889年访日期间，为了写出30卷《日本游历图经》，也常常通宵达旦地勤奋写作。其日记上时有这样的记载：“是夜鸡鸣，草犹未脱”，“脱稿，鸡再鸣矣”。^②

文化交流的大量活动是在民间进行的，它的影响广泛，深入人心，成为中日友好的重要纽带。仍以黄遵宪为例，他与日本各界人士广泛交往，进行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并热情宣传中日友好，主张两国平等相待，互助合作，共图富强。他在驻日期间，除了开始撰写《日本国志》外，还创作了大量反映日本自然、社会、风土人情的诗歌，统称为《日本杂事诗》。这些诗博得日本人的尊崇和赞誉，以至“每一篇出，群奉为金科玉律，日本开国以来所未有也”。^③甚至到他住所拜访的日本人，“执经者、问字者、乞诗者，户外屐满，肩趾相接”。^④黄遵宪还应日本友人大河内辉声的请求，把自己的一部分诗稿埋葬在他的家园中，立碑题名为“日本杂事诗最初稿冢”（原在东京浅草，后迁埼玉县野火止平林寺内）。黄遵宪并作诗曰：“一卷诗兮一抔土，诗与土兮共千古。”大河内也和诗云：“诗有灵兮土亦香，我愿与丽句兮永为邻。”^⑤这真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一段动人的佳话。

又如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王韬1879年应日本《报知新闻》主编栗木锄云等人的邀请，访问日本128天，也进行了大量友好交流活动。日本“都下名士，争与先生交，文酒、谈宴，殆无虚日，山游水嬉，追从如云，极一时之盛”。^⑥他广泛结交日

① 黄遵宪：《日本国志书成志感》，见《人境庐诗草》卷五。

② 傅云龙：《日本游历图经余记》。

③ 王韬：《日本杂事诗序》。

④ 石川英：《日本杂事诗跋》。

⑤ 实藤惠秀：《大河内文书》，231页。

⑥ 中村正直：《扶桑游记序》。

本文化学术界的朋友，仅在其《扶桑游记》中提到的就有近百人之多。1884年，日本学者冈千仞（号鹿门）访华350天，行程万里（包括上海、苏杭、京津、广州、香港等地）。在他的《观光纪游》一书上记载交往的中国文人竟达200多人。至于20世纪初以来，大量中国留日学生深入日本各地，更与广大日本人民结下了深情厚谊。大家都熟悉的鲁迅先生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时，与他的老师解剖学教授藤野严九郎的友谊，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19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军国主义者把中国作为侵略的主要对象，发动了一次次侵华战争，屠杀中国人民，掠夺中国财富，给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都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和痛苦。但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和文化交流。就是在中日之间国家关系恶化，日本统治集团疯狂侵华的情况下，仍有不少日本正义人士坚持与中国友好，继续进行中日文化交流，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例如1900年中国发生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日本政府派兵参加帝国主义八国联军，血腥镇压中国革命，并乘机扩大侵华权益。日本资产阶级报刊也大肆煽风点火，制造反华舆论。在这个时候，日本进步记者青柳猛却敢于挺身而出，在《女学杂志》上发表了《义和团赞论》一文，热情歌颂义和团反帝运动的正义性，痛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种种反华谬论。他严正指出：“为了防御手持凶器的强盗而拿起刀枪，决没有罪，”“我认为义和团是值得同情的，而应该谴责的恰恰正是外国人（包括日本人）和他们卵翼下的耶稣教徒。”^①这在当时的气氛下确实需要有很大勇气的。在辛亥革命前，日本政府歧视中国留日学生，限制中国革命党人的活动时，也都有日本正义人士站出来维护中日友谊。宫崎滔天等日本朋友不仅积极

^① 《女学杂志》513号。参见王晓秋：《日本进步人士同情义和团的呼声》，见《北方论丛》1982年第4期。

支持孙中山等中国革命者的活动，而且创办《革命评论》杂志，写作《三十三年落花梦》等书籍，声援中国革命。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日本资产阶级政府与报刊恶毒攻击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而当时负有盛名的东京大学教授吉野作造立即表示站在中国人民这一边。他亲自给北京大学学生写了声援信，表明“侵略的日本，不独为贵国青年所排斥，抑亦为我侪所反对也”。^①他还主张在反对侵略、和平友好的基础上建立中日两国人民的亲善关系，并积极组织日中青年学者的文化交流活动。正是这种思想感情成为保证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的坚实基础。可以说，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和歌颂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交流，这是近代中日关系研究中不可偏废的两个方面。

以上仅是笔者近几年研究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的几点粗浅体会，恳请批评指正。关于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具体史实，有些部分可以参看拙著《近代中日启示录》（北京出版社，1987年）和《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1992年）。

^① 《全国学生联合会致日本黎明会书》，见《五四爱国运动》（上）411页，并可参见吉野作造：《中国朝鲜论》。